

汪丁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风

的
颜色





的颜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的颜色/汪丁丁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3

ISBN 7-80149-642-6

I. 风… II. 汪… III. 经济学—随笔 IV. F-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0766 号

风的颜色



著 者: 汪丁丁
策 划: 创世纪工作室 路卫军
责任编辑: 孙振远 屠敏珠
责任校对: 杜 明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9.25

字 数: 321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642-6/F·201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写了许多不经意的文字之后，我才意识到夏威夷的海风和这里的咖啡一样，是我最喜欢描写的事物。风的味道，如咖啡般变幻无穷，早晨它是清甜的，中午它带着干草的香气，傍晚它微微发咸。惟独午夜的风最为我所爱恋，它从深邃星空里飘洒下来，充满了这块幽静山谷，神秘莫测，无味无色。

然而风是有颜色的。西方人传说当第一批西方人即将被严冬困死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时候，印第安酋长的女儿波喀艾姐丝给他们送来了粮食。可是1612年，历史学家考证说，17岁的马托卡——波喀艾姐丝的印第安名字，英国人的救星，却被多疑的英国人绑架了，而且就在她去拜访詹姆士城的白人朋友的路上。马托卡的爱人，船长约翰·史密斯也背叛了她，多年之后，她在伦敦偶遇史密斯，直指他是爱情的叛徒。马托卡嫁给了比她大十岁的烟草商罗菲，1617年病死在返回美洲的路上，时年21岁。几百年以来，西方人始终不得不对波喀艾姐丝对史密斯代表的殖民文化的批评“……不错，我也许是个野蛮人，可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无知？那么多无知你却不知道？……你以为这土地可以随意被你们占有？你以为这土地没有生命？让我告诉你吧，这里每块岩石每棵大树每样造化，都有生命有灵魂有名称。你以为只有如你一样外表和思想的人才算是人？让我告诉你吧，只要你追随我们陌生人的足迹，你就会知道那么多你绝不会知道你会知道的事情。你听过灰狼向着蓝色月亮长啸？你问过山猫为什么总是微笑？你能唱出山谷里全部的声音吗？你能画出风中包含的全部颜色吗？……不论我们的皮肤是白色还是古铜色，唱出这山谷里全部的声音吧，画出这风中全部的颜色吧！你可以占有整个地球，但那仅仅是“地球”而已，除非你能唱出这山谷里全部的声音，除非你能画出这风包含的全部颜色。”

这便是风的意义，它呼吁我们敞开心灵，它展现给我们万种风情，它把生活注入我们的思想。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文明、一套理论、一

个思想，只要我们追随陌生的小径，我们就将看见无数不可能变成可能。每一个民族都值得延续，每一种生活都有权活着，每一缕思绪都融入我们的情感。

终于，我看见了风的颜色，二百五十六种色彩，都是从三套频谱组合而来——蓝（波长450纳米）、绿（波长530纳米）、红（波长610纳米）。在这本小册子里，蓝色代表“理性”，绿色代表“希望”，红色代表“爱”，黑色代表“罪”，白色代表“无奈”。就这样，我把这八个月里发表的随笔性质的文章，依自己的喜好浸泡到这些颜色里面去了。并且，基于“作者”对颜色的理解，文章的颜色揭示出它们对“作者”的意义。例如，为什么我要把那几篇应当是“蓝色”的文章涂抹成“白色”呢？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进入“作者”与“读者”的“共同思考”状态。

这是“随笔”的颜色，只不过，也是出于个人偏好，我的随笔集里总搀杂些学术论文。它表明一种态度，它更看重“意义”，为了要有意义，才要有“学术”。于是在我看来，学术是从属于意义的。是“意义”赋予了学术语言独特的生命力，是饱含生命力的语言激动着读者和作者的思绪。我明白，……我逐渐明白了，我正面对着的，是一个“拒绝深刻”的时代，人们不要寻找意义，不要思考生活，甚至不要有心灵。

于是我就把一篇分量最重的纯粹学术论文搀杂进来了，为表明我的态度，我为它涂上“希望”的颜色，希望，希望到了下一个时代，它所代表的“理性”能获得新的生命。

真正的理性是一种智识，它完全不同于纯粹学术。请不要再用数学符号迷惑自己吧！没有智识的严谨形式，无异于最耀眼的枷锁、最庄严的谎言、最礼貌的谋杀。

怀着“告别”般的复杂心情，“世纪之交，义利之辨”涂上了高贵的蓝色，这本文集的第一篇“随笔”，它希望经济学家不要像经济学一样不讲道德。

不错，我拒绝“肤浅”，因为它总是灰色的。不错，我要把“深刻”涂抹成绿色，尽管它应当是蓝色。我要用这山谷里全部的声音歌唱，我要用这风里包含的全部颜色绘图，我要去倾听灰狼的长啸，我要询问山猫为什么总在微笑。

新世纪的第一年，让风吹过来吧！

目 录

第一部分 蓝 色

世纪之交，义利之辨	3
我们仍然要寻找新经济学解释	19
中国人的投资选择	21
为普通人写的经济学（之一至之十一）（开场白）	25
新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59
观念细化与人力资本重组过程中的价值创造	62
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决定（之一至之九）	67
企业并购的知识经济学原理（之一至之九）	88
也谈电信竞争的基本方式	107
与《杭州日报》记者的谈话	109
企业规模与企业家能力	112
平滑代理人败德风险的有效途径依然是市场竞争	116
从噪声污染和产权界定说到科斯定理的应用界限	119
两种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	123

经济学家应当怎样把握数学?	125
社会科学里的“定律”与“定理”	127

第二部分 绿 色

走向生物技术时代的伦理学	131
生物技术的时代——新“新经济”	149
探索解决医患纠纷的合理机制	159
从人类精子库引出的话题	164
关于宽带网时代知识状况的几点看法	167
关于成立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设想	170
关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机构设想	172
关于“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2~2006 年研究专题的设想	174
“制度分析基础”八十篇阅读文章的主题索引	176
民主社会的困境与希望	187
“信仰”的经济学	192
概念格，互补性，塔尔斯基不动点定理	197

第三部分 红 色

西方化的中国社会疾病	221
民办教育天然具有道德合法性	223
反思中国人的艾滋病	225
转型期养老问题——复杂、紧迫、高风险	229
法 难	231

性，性关系与社会发展	234
------------------	-----

第四部分 黑 色

寻找“原罪”	241
预期腐败与制度崩溃	244
直面“劳动与资本”矛盾	246
反毒品的经济学分析	251
文明的意义与意义的冲突	255
全世界文明联合起来！——悼念 2001 年 9 月 11 日惨案的牺牲者们	258

第五部分 白 色

“大熊”何时到？	263
道·琼指数的“第四浪”调整	266
纳斯达克的中期调整：2001 年 8 月～2004 年 8 月	268
美国科技股中期预测：2000 年 10 月～2001 年 10 月	272
国企海外上市公司市盈率严重偏低说明了什么？	275
略谈会计制度的演变	278
“国民待遇”的两个基本条件	280
乡村金融的复杂性	282
什么样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285
有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	287
对文凭的需求	290
生活，职称，逆淘汰及其他	293

第一部分 蓝色

原书空白页

世纪之交，义利之辨

中国社会经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顺世界潮流，跌宕起伏，蜿蜒曲折，历经百年，目睹无数英雄豪杰，有称王称帝者，有立言立德者，有富可敌国者，有大隐于市者，有天降大任于斯者，有举案齐眉意难平者，沸沸扬扬，群情激荡，毕竟风流云散。世纪之交，大江东去，天道如常。

于世纪之交，兴义利之辨，《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无非是承接着百年市场生活与市民社会之流风，针砭时弊，奉持公义，披露实情，敬新闻本业之精神而已。试问天下通情达理之士，哪里有只许权贵勾结尽饱私囊而不许百姓呼喊以求昭彰于世的“市场经济”？哪里有只问金钱利益而置精神价值道德传统于不顾的“社会发展”？可叹区区“基金黑幕”，竟引发千夫侧目，百尺硝烟。大道未隐，方术已欲裂天下矣。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往今来，无数改革毁于假“改革”之名而堂堂于私利者，无数社会迷失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魄力。《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正因此而吸附着泥土和大地，因此而获得了问天的勇气：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一、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当做首要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社会自十九世纪以来始终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转型期内，这一长期过程的主导关系始终是“西力东渐”大格局之内“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异己”之间的双重紧张关系。

就“传统”而言，延续数千年的宗法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不论我们称之为“乡土中国”，“超稳定结构”，还是“内卷生产方式”，其传统力量不可谓不强大。就“现代”而言，西方理性精神自希腊罗

马之后，沉潜千年，发轫于近代资本主义竞争制度，终以科学与民主滥觞世界，其民族国家之坚船利炮，其市场社会之物质文化繁荣，亦不可谓不强大。于是在“传统”与“现代”这两个如此强大的力量之间构成的紧张关系便不能不是基本的、首要的、长期的。再就“民族”与“异己”之间构成的紧张关系而言，越是地域广袤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文化认同感就越强烈，其抵抗异己文化的心态就越普遍。西洋如此，东洋如此，中国更加如此。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鼓吹“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我们批判西方的以及我们自己的文化霸权主义，我们维护对话伦理和交往理性，我们不同意但尊重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立场。在我们看来，只要上述双重紧张关系仍支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仍会存在下去，并作为对西方霸权的一种反叛力量获得道德合法性。

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一百年里，“西力东渐”大格局之内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异己”之间的双重紧张关系仍将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发展的主导关系。多年以来，我们关于转型期各种具体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无不是以这一基本格局为大背景的。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表现出了那一发展阶段独有的特征，这一特征可由下列三项陈述的合取式刻画：（1）从一个不彻底的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向着一个不彻底的市场经济形态过渡，（2）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3）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分崩离析，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远未确立。

上列陈述的第（1）项说的是我们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彻底性”，由此引出的种种深层问题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才“浮出水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次，陈述（2）意味着，如韩国学者曾经概括的那样，“高速增长是最好的药方”，在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冲突和经济隐忧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陈述（3）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价值真空”状态，对于社会之为“社会”而言，这是一种混沌状态，从这里可以生成新的秩序，也可以瓦解为彻底的无序。

从1980~2000年，二十年时光，对于我们所说的几百年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期来说，无异“弹指一挥间”。然而一切制度都是通过特定的一代或几代人来复制自身的，人又是通过特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判断来理解和评价制度的。路径依赖，从量变到质变，短期的边际的波动贯穿起来造就了长期趋势和整体形态的转变。在这二十年里面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必将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我们甚至现在已经看得

很清楚了。

今天，当我们开始体验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试图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特征加以刻画。事实上，在转型期社会的思考中，对眼下社会经济基本特征的刻画，如前述，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因为这特征在时间维度上是不断过渡着的，不稳定的，从而容易被次要因素和个人情感遮蔽了的。

由于上述 1980~2000 年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基本特征的不断发展，还由于上述的整个转型期内“现代与传统、民族与异己”双重紧张关系的深化，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按照我们的理解，可以由下列三项陈述的合取式刻画。

1.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和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转型而言严重滞后，导致了下列发展和改革的深层问题：（甲）创新者利润权利的宪法保护问题。这里“创新者”即指规范语言所说的“企业家才能”，而“利润”则指由创新带来的“价值剩余”，保护利润权利的“宪法”，指的是这一语词本原意义上的、作为特定社会政治秩序的构成原理的“宪法”，只有当文字形式的“宪法”符合着这一构成原理时，文字宪法才具有合法性；（乙）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问题。这里，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释的原理完全没有过时，只要中国无法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就永远是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最基本的紧张关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劳动对资本占据了强势地位的时期不过三十年，而在其余的七十年里，市场经济的“轴心关系”始终是“资本压迫劳动”；（丙）与前两问题密切相关并且起了主导作用的，是我们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一基础的道德根据，对彻底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叫做“剥夺‘剥夺者’”，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来维持剥夺者的被剥夺局面，这一要求本身已经放弃了对政府在其他方面合法性的道德根据的确认。另一方面，对彻底的成熟市场社会而言，普选和代议制的民主政体，权力制衡与互相监督，竞争性的新闻自由和对全体纳税人的信息披露，这三大原理构成政府合法性的惟一道德根据。正是在这两个稳态社会的政府原理的反衬之下，才显出我们自己政府的极端尴尬的处境：这个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要保护“资本”呢？还是要保护“劳动”？还是从阶级压迫的工具外化为社会冲突的仲裁者？或是扮演公司“中国”的执行总裁？抑或是单纯民族利益的捍卫者？不论如何，它无法回避这样两个迫在眉睫的选择：（a）政治科学以及政治传统都告诉我们“名正言顺”的重要性，“正名”而后可以“行事”。我们的政府必须选择一个“名分”；（b）如亚里士多德早就论述过的，事物的目的决定了事物的存

在，政府的职能决定了它生命的限度。我们的政府必须选择自己的职能。

2. 世界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衰退甚至萧条的阶段，从而“后冷战”时代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秩序正逐渐被各国瓜分世界市场的经济利益冲突和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各弱势民族与西方强势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取代。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结束长达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韩国和日本相应阶段的期限都在十五年左右），转入一个低速的从而也是正常的增长阶段，并且很可能随世界经济一起陷入衰退。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各种社会矛盾便格外尖锐地凸现出来，蛋糕小了，贫困威胁增加了，人际关系也就开始紧张。更何况，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过诸如普遍腐败、权力制衡、劳资关系、舆论监督等等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问题。那么，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谁敢断言这些深层问题不以更加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呢？就经济结构而言，当增长速度下降时，投资方向和技术进步的方向都会相应有所调整，企业产品结构和整个产业结构也会有所“升级”（即从边际利润低的产品和产业转向边际利润高的产品和产业），通过升级，企业利润和要素回报，从而人均生活水平得以维持。但是经济结构的“升级”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结果，当我们缺乏足以激励和保护创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时，我们怎么指望经济结构的升级呢？最后，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人口老化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如我们反复强调过的，中国人口将于2020年左右达到老龄化的高峰。从现在起到2020年，只有一代人的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从而确保老龄化人口的劳动生产率足以维持整个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这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发展阶段将是一个艰难和沉重得多的任务。更何况我们还没有确立行之有效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找到合理而有效的人才教育体制。

3. 市场导向的行为模式和“金钱划事”的评价标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那里与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取向发生了严重冲突，激发出包括“政治波普”和“格瓦拉”在内的各种社会反叛行为，强化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亚洲价值”的流行，并且集中表现为九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卷入的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关于中国市场经济与文化前途的论战。如果说，1980~2000年期间是传统价值体系瓦解的阶段，那么未来的二十年很可能将是价值完全失落的阶段。另一方面，经济合作、创新行为、大规模投资，正日益变得复杂化、网络化和敏感化，很难想象在一个价值失落从而行为高度短期化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和信任程度能够支撑大范围的交易与稳定的行为预期。

上列三个方面的状况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将决定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特殊历史进程，推而广之，这一特征将决定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内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历史特殊性或“基调”。

二、资本市场与市场社会发展的一般关系

如上述，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以及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特定历史过程中的制度，中国资本市场的基调是“中国”，不是美国或德国。另一方面，理性又总是试图从各个特定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普遍的一般的关系。这是一种后验的（而非先验的）综合的一般关系，因此它所刻画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不具有“必然性”。

在应用经济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应用过程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概念误解，那就是把统计性的联系与因果性的联系混淆起来指导现实问题的判断和推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讨论资本市场与市场社会发展的一般关系之前澄清这一认识论混淆。

从事件 A 与事件 B 之间的统计相关性，科学不能做出任何因果推理。反之，当我们在事件 A 与事件 B 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在运用“理性”为“自然”立法，是在依赖先验的逻辑的纯粹理性能力从一套先验公理体系出发推演出事件 A 与 B 之间的现象关系，至于这关系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统计检验的支持，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件事情（修正假设和公理体系绝不意味着逻辑推理不是先验必然的）。中西媒体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把统计联系报道为因果联系。例如某医学统计发现适度饮酒的心脏病患者比完全不饮酒和酗酒的心脏病患者有更长的存活期，结果在 CNBC 报道中被说成“适度饮酒可以延长心脏病患者的寿命。”同样，根据了西方某国的成功经验就把一套制度搬进中国社会里，希望收到类似的效果，这是犯了把统计关系当做因果关系的认识论错误。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专家学者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常常会以另一方式犯同样的认识论错误，那就是完全放弃主观努力，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统计规律发生作用上面。例如，眼下许多朋友认为，只要有了市场机制（姑且不论这种孤立的“市场机制”是否存在），什么道德基础什么意识形态，都可以不关心，一切都会自动好起来的。从统计关联角度看，成熟市场社会一方面实行着市场制度，另一方面物质文化生活繁荣。但这仅仅是统计关联，它完全不能取代那些成熟市场社会内部每时每刻进行着的维护自由与公义的努力，以及同样时刻在进行着的营私舞弊弱肉强食的努力，“天使和撒旦在每个人心里”。战后，

特别是1960~1980期间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同样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宪法的、文化的、个体意义的)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动荡与经济萧条。

牛顿力学是因果关系,欧氏几何学是因果关系,数理逻辑是因果关系,而所有这些因果关系体系的初始假设与公理体系都不能从因果关系得到证明(从而才成为初始假设)。此外还有大量不像自然科学和数学那么显著的因果关系体系,例如社会科学体系,例如行动者与其行动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关于个人的思想与努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各种因果关系假设(“英雄史观”?“奴隶史观”?“宿命论”?……)。由于社会科学领域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天性的取向几乎总是干脆放弃“因果假设”的选择,随波逐流,“免费搭车”。

与我们讨论的资本市场问题密切相关的“一般关系”是:(1)发展与泡沫的关系,(2)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3)发展与价值体系演变的关系。这里说的一般关系是统计性的联系,社会科学完全不指望自己能够为如此复杂的联系建立因果关系模型。我们之所以把“发展”当做这三个一般关系的核心,是因为如文章开始所论,中国社会经济在长期内的特征之一是表现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非“成熟”。

“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被叫做“泡沫”的现象,著名者如荷兰的“郁金香热”。泡沫发生的一般机制是这样的:首先,人们——掌握着资源控制权的人们,对某个过程的不断进步产生了兴趣,对“不断进步”本身有了信心和期望,从这信心和期望里又进一步有对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进步幅度的预期。这样,投资回报的理性推理便开始发生作用,开始支持事后看来极其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学习股票市场的历史,我们意识到这样几件事实^[1]:(甲)一切“泡沫”都是事后才被确认为泡沫的;(乙)关于“泡沫”的信息正是通过制造泡沫才引起人们注意的;(丙)市场,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所论,应当被叫做“市场过程”,私人信息在市场过程里转化为公开信息,而泡沫是这一转化的伴生物;(丁)制造了泡沫的人可以借信息在人群中分布的不对称性而获取“非正常利润”,对市场而言,这就是所谓“信息成本”,正如经济周期对社会而言是“市场成本”一样。

所以,泡沫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招引注意力,因为注意力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第一个前提,还因为弱小的新生事物往往只能用制造泡沫的方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个新生企业或项目的扩张过程:(甲)新产品受到客户欢迎,开始从老产品那里夺取市场份额;(乙)新产品的投资回报开始超过老产品,在公司季度业绩报告里受到重视;(丙)公司季度报告和新闻发布会开始对新产品未来市

[1] 参见汪丁丁“‘恩垂’的泡沫与均衡”,《回家的路》。

场扩展的幅度提出预测，在公司资金不足时，融资和投资基金开始注意、跟踪和研究这一新产品的技术和市场潜力；（丁）融资和承销商对特定客户群发表新闻和研究报告，解释投资决策，论证融资的合理性。注意，到了这一步以后，由于享有悠久信誉的投资机构的研究报告从特定客户群流传到公众社会并往往引发新闻媒体的报道，这整个过程才开始向着非理性的“泡沫”转化。如果“偏离真理一步就是谬误”，那么当研究报告挟着大型投资机构的名声在公众社会流传时，恐怕它偏离真理已不止是一步了。

早期的“泡沫”大体上是凭了“口传口”在市场和公众社会里传播信息的，而现代社会，如吉登斯所言，在“空间”上，一方面极度扩展，把整个地球变为“村庄”，另一方面则极度侵入私人领域，把每个人的每个生活角落囊括到公众空间里去。与此同时，在“时间”上，现代社会日益变得敏感化，信息流动速率越来越高，越来越便宜，现在对每个人来说，惟一重要的信息成本是“注意力”的机会成本。这样，在前述“泡沫”的一般性质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指出，“泡沫”在现代社会里的特征是：对特定的公众社会，存在一个明确的注意力“阈值”（注意力受到吸引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一旦超过这一阈值，关于“泡沫”的信息就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从而使它转化为真正的泡沫。但是当注意力还没有达到这一阈值的时候，公众将对“它”表现出现代社会特有的冷漠和蔑视，理由？只因为它不是“明星”。由于泡沫的这一现代特征，泡沫的制造者们不得不以百倍的努力去制造泡沫并且一旦成功就以千倍的仇恨对公众加以报复。

对“因特网”这一现象，我们已经写了大量文章为之鼓吹为之澄清，这里不能一一复述。我们的结论是，只要在这一行业从事创新的企业家可以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它就将证明自己不是“泡沫”。如上所述，一切泡沫都是事后确认的，现在人们争论因特网是否为一“泡沫”，在论题上已经不妥当。因为，首先，因特网作为技术显然不是泡沫，它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了。其次，我们只可以讨论特定的互联网公司，就其特定商业模式而言是否成为“泡沫”，例如目前比较公认的互联网泡沫是“Priceline. com”，它的商业模式已经被它的商业实践否定了。第三，当我们讨论特定企业的特定商业模式是否为“泡沫”时，我们其实是在评价和质询那个企业家的业绩和企业家能力，他能成功吗？他还能转败为胜吗？他还能找到另一个商业模式吗？他还能熬得过这次萧条吗？等等，等等。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投资是与这位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联系着的，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认为“它”不是泡沫，因为“他”不是泡沫。

这里要讨论的第二个“一般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